

宋代 太学重师德

刘永加

历史上,太学本为品官贵族子弟而设,至宋代始,将庶民纳入招生范围。宋徽宗时,太学达到鼎盛。宋代太学教育经过200余年的沿革,期间的教育管理方法较之前代各朝都有了很大的发展。宋代太学对教师的管理主要体现在对太学教师的资格限制、遴选方法、任期及职业的要求等各方面。

宋代太学是官办的最高学府,最初隶属于国子监,后来独立出来,成为专门培养合格官员的学校。在这里,太学教师的职业道德和知识素养尤为重要。

多途径遴选教师

宋代太学经过多年办学,形成了一套比较完整的办学机制。太学生从八品以下官员子弟和平民的优秀子弟中招收。学生分成三等,即上舍、内舍、外舍。太学采取考核学生成绩和学生升等制度,称为“三舍法”,规定新生入外舍习读,经公试、私试合格,参考平日行艺,升补内舍。内舍生每两年进行一次考试,考试成绩和当年公、私试分数皆达优等,升为上舍生,之后即可释褐授官。

学生分斋学习,每斋三十人,屋五间、炉亭一间为全斋,斋舍和会议处所,设斋长、斋谕各一人,负责督促和检查学生的行艺。宋代学官在唐朝基础上,又增加了学正、学录、监书库、监厨官等。职员称学职或职事人,有前廊学录、学谕、直学等。

为了给太学选拔优秀的教师,宋代朝廷对太学教师的选用十分谨慎,以确保太学教师的任用质量。因为是国家的最高学府,皇帝亦十分重视,对于发现的优秀教师人才,会直接下令提升为太学教师。据《宋史》载:“上雅闻先名,召为国子监主簿,赐赉甚厚,令于太学判定历代字书。”于是这个郭恕先就当上了太学教师。

太学生也有权利推荐自己喜欢的太学教师。《宋史·黄晞传》载:“石介在太学,诸生以礼聘召,晞走匿邻家不出,枢密使韩琦表荐之,以为太学助教致仕。”黄晞字景微,建安人。少通经,聚书数千卷,学者多从之游。石介是北宋的思想家和教育家,庆历二年(1042)夏任国子监直讲时,太学生们推荐黄晞做太学教师,石介就应太学生之邀请,聘黄晞为教师。

太学教师还有一个来源途径,就是由低级学官晋升。《宋史》载:“汪灏字仲容,宣州旌德人。少从胡瑗学《易》。又学于王安石,著《三经义传》,灏与其议,又首传其说。熙宁太学成,分录学政……灏自布衣录天子学,至为正,为司业、祭酒,迄于司

成,官以儒名者三十年,一时士人推之。”这种由太学中提升低级官职的做法始于真宗时代,到神宗实行三舍法后,朝廷开始逐级公试,按照公试成绩,再加上对行(道德行为)、艺(经术学问)进行考察的结果来“选察升补”。《皇宋通鉴长编纪事本末》亦有记载:“有能训导学生中太学上舍数及八分者,提举学事官保明以闻,国子监验实,依太学博士正录法改官。”也就是说,为解决太学的师资问题,朝廷不仅录用那些虽职务低但却非常优秀的学官为教师,那些品学兼优的学生经过国子监的考核,也会被授予太学教师,充实到教师队伍。那些优秀的太学生受过良好的教育,具备了一定的才识,同时他们也熟悉太学中的教育教学方法,朝廷不必再对他们重新进行专门性的培训。

通过考试遴选也是宋代为太学选教师的一个办法。《宋史》载:“凡举进士,赴学士院,试经大义五道,取人上者为博士,下等为正录,愿任教授者听。”通过考核儒学经义,考试成绩为上等者可担任太学博士,成绩下等者可担任太学正、录。只是到了哲宗绍圣时期,太学考选师资较以前相比更为严格,除了要求教师具备学历、年龄限制及有国子监的荐举外,还要经过吏部的严格考核才能担任。

宋代太学中也聘用外蕃留学生为太学教师。据《续资治通鉴长编》载,神宗元丰七年(1084)二月,高丽王子僧统及其徒弟三十人来游学,“吏部乞于四选补算学博士阙,从之。”

宋代太学通过多渠道遴选教师,扩大了教师的来源,保证了教师质量和太学蓬勃发展的需求。

注重师德和素养

太学的重要性不言而喻,所以在选用教师上对其道德品质和知识素养的要求很高。

对太学教师道德品质的严格要求有很多,如景德二年(1005),宋真宗命朝廷有关人士推荐的教师要具备“儒术该博,士行端良”的素质,天圣四年(1026)九月,宋仁宗颁诏书规定举荐的教师应为“深明经义,长于讲说,历任无人已脏罪者”,可见,宋代朝廷对太学教师品德的要求是非常严格的,不仅要品行纯良,而且强调有违法犯罪行为的人不得进入教师行列。这一规定有利于纯洁教师队伍,保证太学的教育质量。

对太学教师学识素养方面也有具体的要求。能否胜任教师职责并搞好教学工作,教师本身所具有的文化知识是一个重要的衡量标准。因此,太学教师必须具备一定的学识素养。《宋史·选举志》载:若“制科及进士第”在前五名,礼部奏前三名,府、监及广文馆第一人,或自太学得第者,皆不试而用。《通考》也载:哲宗绍圣元年(1095),诏内外学官,非制举进士出身及太学上舍人官者皆罢。可见,宋代对太学教师除了品德上的要求外,教师本身的学识素养也是一个至关重要的因素。

年龄限制也是太学教师的一个要求。年龄的大小是一个资历和阅历深浅的重要标志,太学的教学内容,大都是文辞晦涩、内容高深的儒家经典,不经过多年的磨炼、积累,很难形成系统、渊博的知识。宋代对太学教师的年龄有明确的要求,如皇祐四年(1052),仁宗下诏规定:“今后应选通经术、有实行、年四十以上者为国子监直讲。”哲宗元祐二年(1087)诏书规定:“内外学官选年三十以上历任人充。”由此可以推断,宋代太学教师的年龄最低要求应该是三十岁以上,否则不能担当为国家培养人才的重任。

太学教师的任期,据《职官分纪》载:“直讲以十员为额,每二员共讲一经,委中书选差或主判官奏举,以三年为任。”《续资治通鉴长编》也载:“太学正、录三年为任。”由此可见,宋代太学教师的任期通常是三年。同时,对于那些任职期

满但又在实际的教学中确实有显著教学业绩的,可以连任。

对教师有特殊要求

为人师表、传道解惑是对教师职业的基本要求,为确保太学教学任务的圆满完成,宋代太学要求教师要忠于职守,讲学时间不得做与教学无关的事。政和五年(1115)八月,刑部大理寺上奏的一条法规规定:“国子监、太学、辟雍官,不许出谒及接见宾客……遇假日,听出谒,乃许见客。”而且规定,太学教师在工作期间若有“迟慢不公,考察不实”的现象时则“加重谴责”。

宋代太学要求教师要清正廉洁,不得私自接受学生的礼物,如有违反,必有严惩。政和四年大观学规定:“太学、小学教谕受贖并以赃论。”《宋会要·职官》亦载:“诏太学、辟雍、州县学职事人,应受贖,并依政和四年二月三日小学旨。茶果酒食之类皆是。”太学教师连学生的果品酒食这类礼物都不能收受,足见朝廷对太学教师的管理有多严格。

再就是太学要求教师在工作期间不得滥用职权,凭借个人好恶对待学生的升留级。太学生体制是由外舍升入内舍、内舍升入上舍。因为内舍、上舍生的待遇与外舍生截然不同,直接关系到学生的前途。而太学教师对于升留级有着一定程度的决定权,所以太学教师在太学生升舍过程中常有徇私舞弊、滥用职权的现象发生,对此,朝廷一贯会给予严厉的处罚。元丰学令中明文规定:“以升补及行艺进退,计人数多寡,为学官之赏罚。缘升舍为奸者,论如违制律,不用去官罢职。”钦宗靖康元年(1126)再次规定太学教师:“敢私好恶去取,重行黜责。”这都体现了朝廷对教师谋私现象的憎恶和严惩决心。

赏罚分明的考核制度

为了激励太学教师爱岗敬业,朝廷对于在教育教学中成绩突出者,会给予精神和物质方面的褒奖,而对于在教育教学中成绩低劣、品行败坏的太学教师,会给予降级甚至开除出教师队伍的处分。

熙宁四年(1071)十月,神宗批准中书门下的奏请,明令中央太学教师的考核要求是:“以三年为任,选人到监五年,与转京官。或教导有方,或职事不修,并委主判官闻奏,当议升黜。”政和三年闰四月,徽宗在《考校程文官降官御笔手诏》指出:“近览太学生私试程文,词繁理寡,体格卑弱,言虽多而意不逮……”朝廷对于导致这种现象的大司成刘嗣明、司业林苏恒等官将一级,国子正副文官降一级薪俸。可见宋代对太学教师职业道德水准的要求是非常高的,对于违反规定的处罚也是很严厉的。

正因为这样,宋代太学在教书育人、培养合格人才的过程中发挥了不可替代的作用。

古人为何尊称老师为“西席”

郑言

我国自古就有尊师重教的传统,古代有“人有三尊,君、父、师”的说法。早在公元前11世纪的西周时期就提出“弟子事师,敬同于父”。《吕氏春秋·尊师》说“生则谨养,死则敬祭,此所以尊师也”。荀子说:“国将兴,必贵师而重傅;贵师而重傅,则法度存。”韩愈在《师说》中曰:“师者,所以传道授业解惑也。”由此可以看出教师在人们心目中的崇高地位。古代对教师的尊称很多,如夫子、山长、先生等,西席便是其中之一。为什么尊称老师为“西席”呢?

中国儒家文化讲究长幼有序,尊卑有别,尤其是在座次上更是界线分明。我国古代席位尊卑有君臣和主宾两种。君臣之席取南向,皇帝在上朝时是坐北朝南的,那是最尊贵的座位,任何人不得僭越,即面南称帝,面北称臣。主宾之席则取东西向,主人出于对宾客的尊敬,自坐东位,即面西而坐,“东家”之称由此而来;而让客人坐西位,即面东而坐,西位为尊位。家塾教师和官僚们的幕客,都称为“西宾”,又称“西席”。所以古人尊称授业解惑之师为“西席”。

这在古籍中也有记载。《史记·廉颇蔺相如列传》记载:“(赵)括一旦为将,东向而朝,军吏无敢仰视之者。”善于纸上谈兵的赵括自己面东而坐,藐视其他的军吏,将夸夸其谈、狂妄自大的赵括刻画得活灵活现。《史记·魏其武安侯列传》记载,武安侯田蚡专横跋扈,妄自尊大,他做了宰相后,“尝召客饮,坐其兄盖侯南乡,自坐东乡,以为汉相尊,不可以兄敌私礼”。田蚡以汉相自居,连他的同母异父的哥哥也不放在眼里,自己面东而坐。《史记·绛侯周勃世家》说,周勃不喜欢文辞学问,不拘礼节,每次召见儒生和游说之士,他面向东坐着,很不客气地跟儒生们谈话,要求他们:“有话就赶快说!”《汉书·王陵传》记载,项羽把王陵的母亲放在军中,王陵的使者来了,项羽就让王陵的母亲面向东而坐,让使者看到自己对王母是尊敬的,以此想来招降王陵。但是王母却不领情,哭着对使者说:“希望替老妇告诉王陵,好好侍奉汉王,汉王是仁厚长者,不要因为老妇而有二心。我用死来为使者送行。”

由此可见,在室内坐西面东是上座。古人将宾客和老师安排在坐西朝东的座位上,以表示尊敬。《汉语大词典》解释说:“古人席次尚右,右为宾师之位,居西而面东。”据史载,汉明帝刘庄自从当上太子,就跟博士桓荣学《尚书》。刘庄即位后,依旧尊重桓荣,以师礼相待。他曾经亲自去大常府(桓荣已封大常)探望,让桓荣面东而坐,摆好桌案和手杖,召百官和桓荣弟子数百人来进行弟子礼。明帝这样做是要为天下树立表率,向社会倡导一种尊师重教的风气。清人梁章钜在《称谓录》中说:“汉明帝尊桓荣以师礼,上幸太常府,令荣坐,东面,设几。故师曰西席。”

古典文学作品里也常把老师称为“西席”或“西宾”。唐代柳宗元在《重赠二首》中有诗曰:“若道柳家无子弟,往年何事乞西宾。”《儒林外史》第二回“王孝廉村学记同科,周蒙师暮年登第”中写道:“申祥甫连忙斟一杯酒道:‘梅三相该敬一杯。顾老相公家西席就是周先生了。’”近现代依然用“西席”来尊称老师。近代诗人王益初的《贺友恢复教学工作》中写道:“西席重登崇宿望,泉皮坐拥重皇皇。”

民间流传这样一副对联:“西席桃李满桑梓,东坦龙蛇尽楷模。”此联只有14个字,却巧妙地运用了六个典故,对仗工整,音韵和谐,语意丰赡,饶有情趣。赞美了老师教育有方,得意门生遍及乡里,且家风严谨,其女婿也是人中蛟龙,个个堪称师之楷模。

“冬烘先生”为何称“冬烘”

许晖

“冬烘”是民间俗语,日常口语中常用,讽刺人迂腐浅陋。“冬烘先生”当然就是指迂腐浅陋的人,过去常用来讽刺私塾里不问世事的教师。“冬烘”一词的出处很多人都知道,但是为什么称“冬烘”,不仅人们不知道,所有的辞典也都没有解释。

“冬烘”一词出自唐代一个有趣的故事。五代时人王定保所著《唐摭言》一书保存了唐代文人雅士的许多逸闻佚事,其中“误放”一条中记载:“郑侍郎薰主文,误谓颜标乃鲁公之后。时徐方未宁,志在激励忠烈,即以标为状元。谢恩日,从容问及庙院。标,寒峻也,未尝有庙院。薰始大悟,塞默而已。寻为无名子所嘲曰:‘主司头脑太冬烘,错认颜标作鲁公。’”

颜真卿,唐代宗时被封为鲁郡公,人称“颜鲁公”。颜真卿不仅是著名书法家,而且还是一代名臣,安史之乱时,颜真卿率兵抵抗,被推为十七郡盟主,有效地阻止了安禄山的攻势。唐德宗时,淮西节度使李希烈叛乱,颜真卿奉命前往劝谕,面对李希烈的刀锋,威武不屈,结果以七十七岁的高龄被李希烈缢杀。

这是“错认颜标作鲁公”一诗的背景。话说唐宣宗时的礼部侍郎郑薰主持科举考试,有个考生名叫颜标,郑薰误以为他是颜真卿的后人,刚好当时徐州一带的兵变尚未平息,为了激励忠烈,遂取颜标为状元。

颜标拜见郑薰谢恩的时候,郑薰询问他的“庙院”,名门望族世有官祭的宗祠称作“庙院”。岂知颜标乃“寒峻”,即寒微之士,哪里有什么“庙院”!这一下郑薰方才醒悟过来,但已经板上钉钉,无法更改,郑薰是哑巴吃黄连,有苦说不出。有人于是作诗嘲笑他:“主司头脑太冬烘,错认颜标作鲁公。”

出典既明,那么“冬烘”一词该作何解呢?原来,这是从郑薰的名字上化出的。薰,烧灼,烘烤,恰好与“烘”同义;冬烘,冬天烘烤,恰好又符合“薰”的温暖和煦之意。因此,“冬烘”即化用郑薰名字中的“薰”字来加以讽刺。这就是“冬烘”这个俗语和“冬烘先生”这个称谓的由来。

语词精奥

晏殊



晏殊与欧阳修

科场师生 政坛陌路

晏建怀

晏殊的身上闪耀着太多令欧阳修眼花缭乱的光环和艳美不已的精彩。

晏殊早慧,七岁能文,曾被钦差大臣张知白称为“神童”。十四岁时,与全国千余考生一起参加殿试,他“神气不慑,援笔立成”,受到宋真宗的嘉赏,赐同进士出身,授秘书省正字,成了少年进士和年龄最小的官吏。

晏殊的词,家喻户晓,如“昨夜西风凋碧树,独上高楼,望尽天涯路”“无可奈何花落去,似曾相识燕归来,小园香径独徘徊”等,都是让人捧为圭臬的经典名句,到处传唱。

仕途上,一帆风顺。晏殊历任太常寺丞、太子舍人、知制诰、翰林学士、枢密副使、参知政事,后来还被宋仁宗任命为集贤殿学士、同中书门下平章事兼枢密使,出任宰相,而且文武一肩挑。在士大夫和才子们眼里,晏殊的经历简直就是一个传奇。

欧阳修幸运,人生第一站遇到了晏殊。宋仁宗天圣八年(1030),24岁的欧阳修参加了礼部举行的考试,晏殊是主考官,出题《司空掌輿地之图赋》,面对这过于僻涩的命题,众考生不是偏题就是走题,唯欧阳修不光扣题精准,而且文采飞扬。于是,晏殊慧眼识才俊,把欧阳修确定为“省元”,即第一名。从此,欧阳修对晏殊以门生自称,执弟子礼。

欧阳修中进士后,出任西京(今河南洛阳市)留守推官。做官之余,他与钱惟演、尹洙、梅尧臣等文坛圣手们诗酒唱酬,佳作迭出,一时文名大振。当时,晏殊的词、梅尧臣的诗和欧阳修的文章,堪称文坛三杰。

晏殊、欧阳修之间的缘分不可谓不深,作为有知遇之情的师生,作为一朝为考官的同僚,作为共领时代风骚的文坛巨擘,应该是

惺惺相惜而又相互提携的,甚至可能产生许多文坛佳话,让人津津乐道的。然而,这段师生情开始得早,结束得也早,虽然欧阳修对晏殊非常尊敬,但晏殊却不喜欢欧阳修,甚至一度到了嫌隙和厌恶的境地,不能不说是个历史的遗憾。

据《东轩笔录》载,宋仁宗庆历年间(1041—1048年),西夏犯边,战事吃紧。当时,晏殊是枢密使,为军机大臣,欧阳修担心老师日理万机,过于辛苦,便在一个大雪纷飞的日子,与诗人陆经结伴去看望老师,希望带给老师一丝安慰。谁知晏殊轻松得很,家里欢声笑语,热闹非凡,毫无军情紧迫之忧,见他来了,还在花园摆酒置茶,开怀畅饮起来。欧阳修深感意外,即席赋诗《晏太尉西园赏雪歌》,中有:“晚趋宾馆贺太尉,坐觉满路流欢声。便开西园扫征步,正见玉树花凋零。小轩却坐对山石,拂拂酒面红烟生。主人与国共休戚,不惟喜悦将丰登。须怜铁甲冷彻骨,四十余年屯边兵。”诗中饱含学生对老师的善意规劝,意思是国难当头,作为军机大臣的晏殊,肩负重任,不应该花天酒地,闲如散官。

晏殊读后,差点儿没背过气去,愤然对人说:“昔韩愈亦能作言语,赴裴度会,但云:‘林园穷胜事,钟鼓乐清时’,不曾如此作闹。”当年韩愈擅长写文章,赴裴度的聚会,也最多只说“林园穷胜事,钟鼓乐清时”,而他欧阳修在同种情境下,却极尽讽刺挖苦之能事,朋友尚不开这种过火的玩笑,何况面对的是老师?果然,欧阳修善意的诗句,使晏殊背上了只顾享乐、不顾天下安危和社稷苍生的恶名,成了他人生的污点。晏殊明确表示:“吾重修文章,不重为人。”《邵氏闻

见录》也十分肯定地说:“晏公不喜欧阳公。”

对于晏殊的愤怒,欧阳修十分不解,颇感委屈和纠结。皇祐元年(1049),在颍州(今安徽阜阳市)任知州的欧阳修给晏殊写了一封信,说:“修伏念曩者相公始掌贡举,修以进士而被选抡;及当钧衡,又以谏官而蒙奖擢。出门馆不为不旧,受恩知不谓不深。然而迹不及于宾阶,书问不通于执事。岂非漂流之质愈远而弥疏,孤拙之心易危而多畏?动常得咎,辄举累人,故于退藏,非止自便……”虽有感激,但更多的是抱怨,抱怨老师对自己的冷漠,有一种追根究底的索问之意。然而,晏殊阅后,却当着宾客的面,敷衍几句话,要文书代为作答,宾客说欧阳修也是当今才子,文章名贯天下,如此回答,恐太草率。晏殊冷冷地说,对于一个科考门生,这几句话已经够看得起他了。可见,晏殊的确不喜欢欧阳修。

晏殊不喜欢欧阳修,难道仅仅是因为那首规劝诗吗?这对于一个具有领头雁风范的文坛宿将和当了多年宰相的人来说,未免有些小气。从晏殊扶持后辈不遗余力的习惯来看,也不至于如此浅薄。那么到底是什么原因导致晏殊对欧阳修由喜到厌呢?

从性格上看,晏殊闲适平和,崇尚道家,守成忌变,他任相十余年,始终延续着吕蒙正、李沆、王旦等人的执政风格,尚宽简,不苛细,清静无为,垂衣而治,遂有“太平宰相”之名。欧阳修却耿介而切直,执拗而刚烈,好论时弊,好争长短,且以风节自持。正如《宋史·欧阳修传》说:“修平生与人尽言无所隐。”无论对象是谁,有批评就说,有意见就提,毫不忌讳。晏殊任相期间,提拔欧阳修出任谏官,面对有恩于自己



欧阳修